

# 觅苏州核心文化 凝当代苏州经验

□刘志权



《寓》价值理性于工具理性——苏州世界遗产典范城市的形成与发展  
高坡主编  
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2年4月

说到苏州，总会联想到她江南千年诗风词韵氤氲的感性，以及兼具日常烟火与繁华富丽的生活气息。但是，要真正理解这个建城两千余年却依旧年轻时尚的城市，仅靠感性体验或者生活经验是难以穿透的。尤其是，作为“世界遗产典范城市”的苏州，早已不仅是中国的苏州，也是世界的苏州。要真正深入理解她，有必要在世界与历史的双重尺度下，了解其融合文化、艺术、历史、地理、水利、建筑、经济等诸多元素的丰富与深邃。

这其实是高坡主编的《寓价值理性于工具理性——苏州世界遗产典范城市的形成与发展》(以下简称“《寓》”)一书带给我的启发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在苏州生活近三十年的高坡向有诗书当行的诗人气质，乍见其用“理性”审视“感性”的苏州，不免有牛入兰圃、不解风情的愕然。但品读之下，不得不承认，这一角度朴实而富有洞见。事实上，对集光环与宠爱于一身的苏州，文采与颂扬是容易的，而舍近求远叩问其“存在之由、变迁之故”，恰恰体现了高坡对苏州之爱及责任担当。

就体例而言，《寓》在苏州的多种面向中，取其荦荦大者，从地理与历史、城池沿

革、城市文化、古典园林、大运河、苏作手工艺、苏州丝绸等七个方面分头论述，毋宁说是七篇条分缕析、理路谨严的学术文章。例如，说到姑苏城池沿革，便会列举相关研究专著有哪些，见于论文集的有哪些，见于刊物论文的有哪些，然后说“这里谨据以往研究作概要介绍如下……”，重要之处，还会辅以图表、数据、地图；再如关于苏州与江南的关系，《寓》指出，有狭义的“五府六府”的核心江南，“八府一州”的经济江南或财富江南，以及融汇楚吴越文化的文化江南，而“无论从江南的哪一种划分看，苏州都处于太湖流域的中心位置”。如此，要言不烦，成言必有出处，所述皆为信史。也许难以成为案头消遣，但对有心思考苏州的读者，便毫不枯燥，且会多有所得。

当然，分头论述并非各自为政，而是草蛇灰线，最终指向苏州作为“世界遗产典范城市”的精神内涵。要言之，利于农殖的地理条件，农业与手工业高度发达的良渚文明，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条人工运河大运河，再到伍子胥所建“象天法地”的阖闾大城，构成了姑苏古来繁华的历史基础。而作为远离中原的“蛮夷之地”，苏州以政治失意为代价，每每成为权贵躲避战乱的后花园，成就了士族文化兴盛、经济繁荣富庶的“江南之最”，形成了“以追求文化教养、重视经济利益”为鲜明特征的江南核心文化。其文化呈现，即自范仲淹至顾炎武、顾祖禹等的“吴中实学”，其内涵包括了经学实学、经济实学与科技实学。为了强调这一观点，作者在苏州“天下三甲”的论断中，断然将“学甲天下之学”调整到最为重要的位置，可谓发见敏锐。

基于上述主体线索和结论，编者创造性地援引马克思·韦伯观点，提出将“吴中实学”的成功历史经验进行现代性改造的方案，认为寓价值理性于工具理性，造就了苏州精明、务实、平和、朴实的工具理性之“表”，以及诗性、激情、理想主义、先忧后乐的价值理性之“里”。“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，在苏州贯穿古今，既创造了辉煌

的历史，又统辖着今天的奋斗；既是先民的文化遗产，又是当下的市民精神。”这是对既往苏州经验的诠释，也是对未来苏州发展之路的展望。

为了不让这一结论流于抽象的概念演绎，《寓》慧眼独具，从纷繁的历史中，抓住了晚明“吴韵”向“苏风”转型这一典型现象。一言蔽之，“形而上的苏州创意(苏意)，转而化作形而下的工艺、器物(苏式)，同时成为流行寰中的生活时尚和文化样板(苏样)。”例如，举凡苏州的园林构造、器具清玩、作坊技艺等，往往都是苏州文人创意与苏州工匠技术合作的结果，故能雅俗共赏、审美与实用兼顾。结果是，苏样苏式不仅“海内僻远皆效尤之”，也远播海外，“视海如陆，视日本如邻室耳”，清代日本学者对此感叹：“艳羨吴越之胜，梦寐神游，不能忘于怀也。”与此同时，苏州也反向吸收西方，如洋务运动对传统缫丝技术的提升，吸收西画原理而形成的苏州仿真绣与乱针绣等，充分体现了融价值理性于工具理性所形成的兼容并蓄、力求创新的“苏式”传统。正因如此，如《寓》指出，美国学者认为明清江南比十八世纪的英格兰更有活力，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发展活力被历史低估了。个人认为，这一论证尤为精彩。

因此，《寓》不是一本轻松的苏州手册，而是践行苏州文化精神，对苏州的致敬之作。当下中国经济高速发展，创新意识与工匠精神成为时代的主旋律；同时中国也一直强调文化自信，探寻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。在此语境下，《寓》所贡献的“寓价值理性于工具理性”的“苏州经验”，也理当是值得重视的“中国经验”。而作为反题，如《寓》引罗素《中国问题》所云，“中国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沿袭数千年，若能被全世界采纳，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。然而欧洲人的人生观推崇竞争、开发、永不平静、永不知足以及破坏。”时值西方多事之秋，回顾罗素的这一观点，恐怕能对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重要性有更深刻的认识。

□李超

# 追梦的人生最精彩



《守得云开见月明》  
景扬  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1年12月

实现中国梦是一场历史接力赛，在通往民族复兴的赛道上，一批批青年骄子以梦为马，奋勇争先，不断成长与崛起。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长篇小说《守得云开见月明》，向读者展现了拥抱传统、瞩目未来、创造创新、终成大业的当代中国青年形象，深深激励和鼓舞人们励志图强，扎实奋斗，在平凡的岗位上努力绽放青春的风采。

青年是国家与民族的未来和希望，青年面貌反映着时代的精神气象。《守得云开见月明》一书，通过塑造青年形象，生动反映宏阔的时代精神。这部小说以独立女性陆芸为作品中主要塑造目标，讲述她从青年时代开始，历时大半生的曲折回环、跌宕起伏，历经无数的艰险和磨难，不断克服创业道路上的重重困难和考验，通过与同伴们的精诚协作，以永不言弃的信念，完成了

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创业之旅，创造了奋斗者的“奇迹”，成长为我国首位“女药王”。故事背景横跨三十多年，正是我国医药界迎接“全面创新”新征程的重要时期，女主人公始终秉持“研发改变命运，创新成就未来”的信念，在艰辛的发展道路上敏锐抢抓机遇，勇毅拼搏进取，终于成为制药行业内当之无愧的一匹黑马，其带领的企业所研发生产的抗癌症、治肝病等新药，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，挽救了无数濒临破碎的家庭……

青春向来是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，青春化书写已成为创作成功突围的一个有效途径。很多优秀作品在创作中融入青春元素，通过青春叙事，诠释个体与国家、青年与时代的复杂际遇，进而通过主流价值引领青年个体信仰价值，激发读者的集体共鸣和广泛认同，实现在思想性、艺术性等诸多领域的突破。《守得云开见月明》一书也不例外，该书不仅层次丰富地呈现了在内容创新挖掘、行业纵深剖析、社会价值探究上的题中应有之义，更立足时代舞台、反映社会变迁，表现一代年轻人胸怀“国之大者”的胸襟与情怀，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的理想与奋斗。

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形象。读《守得云开见月明》一书，在以女主人公陆芸为首的青年创业群体中，你会联想到《创业史》中的梁生宝、《人生》中的高加林等众多挥之不去的经典形象。他们虽平凡却不甘于平庸，他们遭遇挫折却百折不挠，以刚健有为、质朴清新的特质成为一个时代的醒目标识。它伴着历史的足音，穿越时空的隧道，带给读者持久的感动。

小说从现实中提炼出一个时代的英雄主义精神，推送到读者面前，那就是将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时代的洪流，在平凡的人生中演绎奋斗的精彩。他们勇于尝试，追逐梦想，赋予平凡生活以不平凡的意义。小说把人们常说的“当立鸿鹄之志，应有不屈之心”这句话，镌刻在主人公陆芸的人生坐标上，激励淬炼青春，砥砺自我成长，折射出一代青年的志气与骨气、希望与未来。

“阳春召我以烟景，大块假我以文章”。近年来，该书作者汤景扬深入生活、扎根基层、汲取营养、俯拾素材，用心发现，用情书写，创作了《绿罗花开》《追光者》《筑梦情缘》等多部长篇小说，其中，《筑梦情缘》还被改编为电视剧在湖南卫视等多平台播放，引起轰动效应；《追光者》获第三届爱奇艺文学奖“最佳现实题材奖”等等。为了创作好《守得云开见月明》一书，她深入连云港中华药港“四大药企”，广泛收集相关资料，采访了企业有关部门和管理者、技术员、职工等，查阅大量的档案和文献资料，为小说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在追求准确性、故事性的同时，作品通过大量鲜活细节刻画青年创业者群像，同时，以诗艺之心与理性之观映照医药行业的现状和发展，努力提升作品的艺术境界。应该说《守得云开见月明》一书是一部有“根”的作品，它的“根”深扎在火热的现实生活之中，书中那些鲜明与生动的人物与故事生机勃勃、活力四射；那些个人与群体的酸甜苦辣、喜怒哀乐感人肺腑、温暖人心。作者通过形象化、艺术化的呈现，有力传达时代精神，唤起精神力量，由此展现人们所期许的锦绣未来。

# 四海为家话鲁迅

□夏丽权



《鲁迅的门牌号》  
薛林荣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5月

《鲁迅的门牌号》，是薛林荣“微观鲁迅”系列的第四本，也是收官之作。本书以鲁迅学习与工作过的地方为线索，向读者展现了鲁迅如何走过了悲喜交加的人生之路。

1881年，鲁迅在绍兴东昌坊新台门周家呱呱落地，仔细数来，他与周恩来算是同祖同宗的亲戚。17岁时，家道中落，在母亲的鼓励下，他离开故乡，先后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和矿路学堂学习，并从在南京上学开始将名字由周樟寿改为周树人。他并不满足于在南京学到的本领，1904年，鲁迅远赴日本，开启了五年的留学生活。

这段生活，几乎对鲁迅的人生起到了关键作用。从东京到仙台，他结交了许多中日朋友，包括在仙台学医遇上的藤野先生，还有在东京一起租住“伍舍”的许寿裳等人。“伍舍”，本是五个学生共同租住的意思，但因为此处是大文豪夏目漱石的旧居，不论是居住条件，还是名气，都令鲁迅很满意。后来，羽天信子来伍舍帮佣，最终成了周作人的妻子。然而，信子成为周家一员，也为数年后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坛公案，埋下了伏笔。

至于鲁迅在日本的收获，除了文学翻译和写作上的成就，就是鲁迅在思想上的变化。离开日本回国时，他已经清楚地知道，医学救不了晚清，他要以笔为锋，以墨为刃，刺醒沉睡已久的中国人。不得不提的是，在日本期间，鲁迅回了一趟绍兴，与朱安成婚。这是另一个鲁迅一生的痛点，以至于他的苦闷无处消解，直到今天，依然有人在讨论鲁迅与朱安婚姻的是是非非。在这件事上，我认为，错不在当事人双方，而在那个时代。鲁迅与朱安，都是非常善良、讲究体面的人。乔丽华的《我也是鲁迅的遗孀：朱安传》，就鲁迅的这段婚姻，写得很清楚。

鲁迅回国后，在浙江任教，居住过三年。他的责任感与勤奋，显然令他在旧式学堂里的工作，感觉颇不愉快。待到1912年，鲁迅赴北平教育部任教，才迎来了一段人生里短暂的春天，也就是初到北京住绍兴会馆的那段日子，鲁迅活脱脱的像一个衣食无忧、兴趣广泛的快乐单身汉。等到斥巨资买下八道湾11号，兄弟失和，再到寄居砖塔胡同61号的陋室，终于买下了宫门口西三条胡同21号，今为北京鲁迅故居及鲁迅博物馆所在地，鲁迅共计在北京生活了14年。

在北京，无论居住条件多么艰苦，鲁迅都笔耕不辍，甚至自娱自乐地在西三条胡同给自己建了一间老虎尾巴书房。在阅读中，我们会发现，鲁迅天生有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。不管他为母亲、兄弟、朋友承担多少职责，他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写作，也就是他从日本归来所追寻的理想。不论如何迁徙颠簸，他始终是位理想主义者，在奔赴理想的路上，不遗余力。

正是鲁迅的这种拼搏精神，令他继续远走厦门、广州，与其说为了生存而选择在南方教书，不如说他在追寻生命与理想的路上，又积累了一点经验。直到1927年，他与许广平同居上海景云里，鲁迅已经成为了坚定的革命者，与瞿秋白、柔石等人成了终生朋友。而那时，鲁迅的身体每况愈下，只在上海生活了9年，多亏有许广平和小海婴为伴，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里，不仅有他追求已久的事业、理想，还有他过往求而不得的家庭和睦。

鲁迅是伟大的，但并不代表他没有痛苦。这些痛苦，正是在鲁迅日常抵抗与接纳中，一点点地消散。四海为家的鲁迅，得以在上海安息。而我们这些后来人，只能在他的生活过的地方以及创作的作品里，去接受这场“惜别”了。